

#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八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8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  
文字研究中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8461-1

I.①民… II.①北… III.①民俗学—研究—中国  
②汉语—语言学—研究 IV.①K892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047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SÚ DIǎNJÍ WÉNZÌ YÁNJIŪ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八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461-1

---

2011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任：董琨

委员(音序排列)：

安平秋 郭锡良 何九盈 黄天树 江蓝生 李强

刘魁立 鲁国尧 王邦维 张博 赵诚

主编：王宁

副主编：董晓萍

编务：黄易青

# 目 录

## ● 特稿

- 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上) ..... 何九盈 1  
从非汉语反观汉语 ..... 戴庆厦 28  
人文学科大家周祖谟先生的学术成就 ..... 鲁国尧 43  
周燕孙先生学术论著系年要录 ..... 李子君 58

## ● 民俗学

- “文化空间”的民俗地理学研究 ..... 董晓萍 王静爱 80  
中国赌神信仰初考 ..... 万建中 王素珍 94

## ● 文献学

- 王沂行事考述 ..... 韩格平 104  
西夏文《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初探 ..... 聂鸿音 118  
《生经》及相关经本之勘正 ..... 胡敕瑞 124

## ● 文字学

- 西周金文的“甗”、“璉”、“黠”、“望”、“望”等字 ..... 赵 诚 133  
横变提与竖折钩变竖提的变异条件 ..... 李国英 周晓文 149  
虢国金文构形考辨 ..... 罗卫东 153  
古籍数字化中的汉字信息处理 ..... 胡佳佳 163

## ● 训诂学与词汇学

- 词的语法分析必须以音义结合为基础——以“恶”字为例 ..... 孙玉文 174  
论汉语词汇意义系统的分析与描写 ..... 李运富 190  
《左传》膏肓之“攻”释 ..... 张 猛 202  
骈赋几类句型语用效应分析 ..... 马燕华 208

- 汉语双音词复合词的理据重组 ..... 孙炜 李宁 217  
“月亮”的词素序——兼论 A-AB 式双音化对词素序的制约 ..... 谢永芳 227

## ● 音韵学

- 《虞山方音辨讹》所反映的 19 世纪中叶常熟方音(上) ..... 丁 锋 233  
司马光《潜虚图》用韵与宋代语音史问题 ..... 张民权 249

## ● 词源学

- 上古汉语词源意义的数理内涵论纲 ..... 黄易青 267  
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答问 ..... 孟蓬生 279  
词源意象与汉字形象论析 ..... 陈晓强 304

## ● 博士生论坛

- 《礼记》及郑玄注反映的秦汉齐鲁方言声母 ..... 叶冬梅 313

## ● 学术简讯

第十一届国际暨第二十七届台湾地区声韵学学术研讨会

- 论文综述 ..... 高永安 325  
  
英文提要 ..... 339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稿约 ..... 350

**编者的话：**“汉字文化”的提出，是寻找、确认、肯定那些渗透、积淀于汉字体系甚至石化于其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及其体系。在汉字与汉语语音体系、意义系统的关系，与中国书籍的关系，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本文对汉字及其文化进行纵横古今中外的反省式的评价。何九盈先生认为，汉字的问题，不止是形体结构问题、繁简问题，也不止是文化问题，对她是是非非的评价，纠结着读写难易、文化精糟、历史荣辱、国运盛衰，还有士子情结、世风厚薄、人心忠奸，以及历史惯性和西化冲击、经济运载和技术支撑等诸多因素，人们还应当注意到汉字超越方言的性质和重要的文化、政治作用，特别是汉字对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起着重要的作用。形音义三者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作者的一些主张，集中体现作者几十年来多方位、高层次、辩证地对汉字文化的思考及所具有的独特感情。何先生此文共有五个部分，本刊将分两辑刊发，以飨读者。

## 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上)

何 九 盈

**提要：** 汉字文化是随着汉字产生以来就存在的，而“汉字文化学”作为原创概念提出，则是当代汉字研究者接受时代思想文化风暴洗礼的产物。当代人们对汉字的研究、使用和态度，不仅很难回避几千年来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更要直面百余年来汉字所遭受的曲折命运。此间的汉字命运，随着两种汉字文化观即理性的汉字文化观与非理性的汉字文化观较量的反复而曲折，而曲折的程度，则取决于汉字文化问题上非理性认识或行为的激烈程度。检讨这些非理性的认识或行为，是当代汉学研究者应有之责，也是当代电脑技术迅速发展、中西观念再一次激烈碰撞之际，人们势必对汉字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再一次审视之时，必须进行的民族文化自省。

**关键词：** 汉字 汉字文化 中国文化 汉字文化观 中国近现代史

### 引 言

“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1〕这一全称肯定判断，是日本学人提出来的。

这样的判断，西方人提不出来，同样，中国人也提不出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研

---

〔1〕 [日]平冈武夫《日本文〈中国古代书籍史〉序言》，见《书于竹帛》附录三，第18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究历史甚短，中国人自己又“不识庐山真面目”，日本学者，只有日本学者，“旁观者清”，这是概乎言之。

但中国人也并不从来都是“当局者迷”。

先秦人将汉字神秘化，  
西汉人将汉字经典化，  
魏晋人将汉字美学化，  
唐宋人将汉字格律化，  
元明人将汉字音乐化，  
清代人将汉字学科化。

现代人变了，现代人曾经将汉字妖魔化。当代人的使命就是去妖魔化，重新认识汉字，重新评估汉字文化的价值。

## 壹 汉字文化的头脑风暴

像我这种年龄的人，曾经长期以“驯服工具论”作为律己的不二法则，头脑如死水，哪能有风景。到了新时期，才常以换脑筋、转变思维方式为己任。所以，我的汉字文化研究过程，也是头脑经受风暴洗礼的过程。

50岁以前，我是汉字改革派的拥护者。列宁说：“拉丁化是东方的伟大革命”，毛主席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2〕我对这类“最高指示”都视为不可怀疑的政治信仰。

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对汉字和汉字文化终于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汉字文化学”这个新概念的提出，就是头脑风暴的产物。

1998年我为《汉字文化学》写的《后记》说：“十年前，我就答应一家出版社写一本汉字文化学。”也就是说，“汉字文化学”这个概念，80年代在我头脑中已经定型，且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必须要有一本专著才能把头脑中的种种意见展示出来。当时积攒的许多资料、笔记可以为证。1990年，机会又一次来临，北大出版社邀请我担任《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主编，在我为此书撰写的《前言》（《汉字文化学简论》）中“汉字文化学”作为一个有确切内涵与外延的学科概念正式提了出来，由当年的北大学报公开发表，这是我个人关于“汉字文化”的第一次“头脑风暴”。

---

〔2〕 转引自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7，第1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列宁的话是他给当时的新文字全苏中央委员会主席阿葛马里·奥格雷的信中说的。（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第366页）

1999年出版的《汉字文化学》,标志着这门学科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个架构在汉字文化研究史上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时人已有若干评说,至于它的深远意义,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比之《汉字文化学》,《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的影响要大得多。此书的理论意义及历史系统性虽比不上《汉字文化学》,可它的实用性、资料价值及涉及面之广,前者无法比拟。要之,二书性质不同,前者为个人专著,重在理论框架建设;后者为大型工具书,集体编撰,重在向世人昭示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200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提议重新出版《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于是,我与人教社合作,克服重重困难,联络众多原作者,得到他们的支持,一一签订合同,对北大版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做了一次全面修订。对我而言,虽然要付出不少精力和时间,但又是甚为惬意的一件事,目睹《大观》中某些不完善及个别很刺眼的毛病,深感对不起读者,心有不安哟!有生之年能与其他作者一起进一步完善此书,对子孙后代负责,何乐而不为!集体编撰,遗憾难免,主编有统合之责,无修改他人观点之权,不求读者谅解,只能说,我们的确努力了。

人教版《汉字文化大观》,我提议设立笔谈栏目,让主编、顾问、特约审订人全都有发言机会,为共建“汉字文化学”各抒己见。我以《汉字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为题,从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视野大背景揭示汉字文化的盛衰之理。两“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市场与科技。在21世纪研究汉字文化学,如果忽视市场与科技,借用韩非子一言:“非愚则诬也”(《显学》),这一认识也是头脑风暴的产物。

市场和科技曾给汉字文化带来危机,也为汉字文化的复兴带来了生机。市场和科技代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全球化的实力,也直接或间接决定一种文化的命运。质而言之:汉字文化的生存问题,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问题,很大程度上要看市场的“行情”而定。市场又要靠科技来支撑。在信息时代,信息是技术,信息也是市场,信息又是文化,汉字能离开信息而生存吗?

一提起市场这个话题,在某些学院派人士和自命清高的书生看来,似乎有辱斯文、情操,非我辈所宜言。“子罕言利”,“何必曰利”,这是古训,也是文化传统,但已完全不适应于当今社会。当今世界文化(包括我们的汉字文化),没有不受市场制约的。这个市场是指世界市场。马克思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我在《汉字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其中“一切”这个词共

出现了六次，〔3〕而“一切”的“一切”就是两个字：市场。从马克思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全世界念的还是“市场”这本经。我们曾经拒绝念这本经，要消灭商品经济，结果是不仅经济发展不起来，汉字文化同样发展不起来。纵观历史，一部屈辱的、挨打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从市场开始的。各个不平等条约，归根到底是因为市场。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一就是五口通商。可叹的是人来“通”我，我不“通”人，汉字文化当然无地位可言。到后来，中国人民说是站起来了，而汉字还是站不起来。因为有一条不通的“逻辑”紧紧地套在汉字头上，这条“逻辑”的推导过程是：

落后就得挨打。

为什么落后？因为教育不发达。

教育为什么不发达？因为汉字落后。

所以，汉字有罪。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4〕

而且，按照以前的经济理论，市场属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消灭，商品要消灭，市场当然也要消灭，汉字又怎能凭借市场的力量走向“世界市场”呢。

我以为：三十多年来，中国最根本性的进步就是全民都在念“市场”这本经。我们学会了带有常识性的根本道理。

——市场本身并没有阶级性，既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

——当年中国挨打是“市场”惹的祸，当年汉字挨骂也是市场惹的祸。

——如今，由“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变中国为“世界市场”，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中国市场的发育成长，尽管问题多多，但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已有举足轻重之势。

——随之而来是汉字文化走上了世界。一定要瞪大眼睛看清楚：是市场将汉字文化推向了世界，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力量；是市场派出孔老夫子下西洋，而不是“四书五经”或“新儒家”有什么吸引力。我说过：“现在人们所说的‘汉语热’，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外国人学汉字、学汉语，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5〕孔夫子如果离开市场，寸步难行。有人说“人类要回到 25 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此话可以哄哄书呆子，市场可不听这一套。孔子如果有那么丰富的“智慧”，鸦片战争时期他老人家干什么去了，抗日战争时期又干什么去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然极为片面，却不是胡乱提出来的。汉语、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儒学曾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但不是中国文化的根。汉字、汉语牵涉到全中国每一个人，牵涉到五六千年的中国文明

〔3〕《汉字文化大观》，第 12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

〔4〕1936 年香港新文字研究会追悼鲁迅对联的下联，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第 223 页。

〔5〕《汉字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见《汉字文化大观》第 17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

史,儒学并不具有这样的地位和价值。

汉字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属于传统文化,二者关系之密切到了互相渗透的地步,以致新文化运动时期将二者捆绑在一起,加以攻击。教训何在?根本原因是思维科学不发达,缺少科学头脑。所谓科学头脑,并非指“政治正确”,也不是指意识形态,而是指人的一般思维能力,是哲学层面的问题。与其“全民学英语”,不如全民学哲学。人的思维能力正确了,判断力正确了,就可从根本上解决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人进入“世界市场”,百年内能大见成效,而要打造科学头脑、“世界头脑”,恐需更长时间。

正确的思维能力、判断力的获得,必须不断启蒙。“五四”启蒙着重在“民主”、“科学”,着重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及束缚人的封建礼教,而一般的思维能力、判断力并无根本的转换,甚至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思维判断力就显得很幼稚、很不成熟,故他们对于汉字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发表了许多“没头脑”的意见。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不仅与世界隔膜,就连国人自己也无法沟通了。正常的思维能力被认为不正常,遭受种种打击、迫害,不正常的思维能力反而喧嚣一时,文化如何生存、发展!不要低估反思维科学的遗毒!

1784年(当乾隆四十九年),比戴震小一岁、与纪晓岚同年的康德已经60岁了。发表了《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文章开头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Sapere aude<sup>[6]</sup>!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政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2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从晚清到现在,中国已经“革”了好几次“命”了,而人们在汉字文化问题上所表现出“不成熟状态”,新旧“偏见”所造成的“圈套”,乃至文字学家在“运用自己的理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时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不正说明今日中国需要“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吗!至少对我这样“缺少思想”的人来说,急需“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阐述自己对汉字文化的一些新的认识,“成熟”还是“不成熟”,

[6] 译者何兆武原注:“[要敢于认识!]语出罗马诗人贺拉士。”又,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89页:“康德建议作为启蒙运动座右铭的贺拉斯的诗歌叠句:‘敢于知道——开始罢!’”《朱高正讲康德》第8页:“诚如大文豪席勒为启蒙定下‘勇于认识’(Sapere aude)的标语……”,不知何所依据。

是否又中了什么“圈套”，我没有过多考虑。“要敢于认识”！也是我的座右铭。

## 贰 百余年间两种汉字文化观的较量

这里说的两种汉字文化观是指理性的汉字文化观与非理性的汉字文化观。

区分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是什么？

是价值尺度，价值评估。

如果说“文化是制度之母”，那么文字就是文化之母（这里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时，也包含“文明”在内）。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文字永远属于核心价值。维护核心价值，属于理性行为；反对核心价值，则属于非理性行为。

百余年间，在汉字文化问题上非理性认识或行为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流派：

### 一、“大同”派的汉字文化观

以谭嗣同(1865—1898)为代表。谭于1896年著《仁学》，“将以会通世界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7〕他认为“同生地球上，本无所谓国……”，“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统之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尽虚空界，何况此区区之一地球！故言佛教，则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又其不易合一之故：由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若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国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8〕

这是冶儒佛为一炉的“大同”派。以佛教统一地球，国家不复存在，实现儒家幻想的世界大同。在谭嗣同看来，地球之所以不能一统，人类之所以不能合一，其障碍在各国的“语言文字万有不齐”，互不相通。扫除障碍的办法，就是统一文字，尤其是要改“中国之象形字”为“谐声”，即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但谭嗣同并没有说全球语言也要“合而为一”，而是“各用土语，互译其意”。也就是每一种“土语”都有一套拼音文字，各“土语”间经过“互译”可以沟通。对本“土语”而言，拼音文字确有“朝授而夕解”之捷效；若要“互译其意”，则并无“彼作而此述”之便利。因为各“土语”都有自己的声韵系统，所设计之“谐声”必然有别。结果，“土语”是言文“合一”了，“愚贱”也能“遍晓”了，“朝授而夕解”了，却加大加深了各“土语”间的“不相通”，加大加深了各“土语”社会之间的分裂、不

〔7〕 梁启超《仁学序》，见《仁学》附录第82页，中华书局，1962年。

〔8〕 《仁学》第65、76、62页。

统一。反而不如“象形字”有合一之功。各“土语”虽以土音读象形字,但其形其意是统一的,故能“彼作而此述”。总之,各“土语”和各“谐声”之间的矛盾,只有消灭土语才能解决。也即全地球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地球之教”,才“可合而为一”。但这种主张纯属乌托邦〔9〕。即使作为乌托邦,也无法自圆其说。谭嗣同的文字观显非深思熟虑的产物。我称之为“派”,是因为这种朦胧的大同文字观非谭嗣同一人所有,当年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乃始作俑者,谭嗣同只不过做了具体的发挥。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

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

(《仁学·附录》,第82页)

证之康有为《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言,梁启超的“发挥”说是根据的。

《我史》光绪十年(1884年)条云:

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宇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盈按: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康有为据公羊学推演出“三世”,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推得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

(《我史》,第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康有为提出,世界大同之后,“欲立地球万音院……,以考语言文字”。〔10〕

民国二年(1913年),《大同书》的甲、乙两部分发表于《不忍》杂志。乙部第三章中康氏对大同世界的语言文字问题有较为系统的设想:

各国语言文字,当力求新法,务令划一,以便交通,以免全世界无量学者,兼学无用之各国之语言文字,费岁月而损脑筋。若定为一,增人有用之年岁,公益之学问,其益无穷。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易简,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数学、律学、哲学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须也。故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但各国并立,国界未除,则各国教育,当存其本国语言文字,以教其爱国心,为立国之根本也。故一时虑未能废去,但当定一万国通行之语言文字,令全地各国人人皆学此一种,以为交通,则人人但学本国语言文字,及全地通行语言文字二种而

〔9〕 列宁《两种乌托邦》:“乌托邦是一个希腊字,按照希腊文的意思,‘乌’是没有,‘托邦’是地方。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10〕 《我史》,第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已，可省无限之岁月，可养无限之脑力，以从事于其他有用之学矣，所谓“不作无益害有益”也。且移无用之岁年，为有用之岁年，移空费之脑力，为实益之脑力，合世界人计之，其余剩年月脑力，巧历不能算其数。以为非常之学思，创非常之器艺，其文明进化之急，岂可量哉！及国界已除、种界已除后，乃并本国本种之语言，而并舍之，其文字则留为博古者之用，如今之希腊、拉丁文及古文篆隶，印之霸厘及山士诰烈可也。（中国文乃有韵味者，不易去也。）

（《大同书》，第66—6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

总的目标是要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定为一”。理由是便于交际，减少学习语言文字的时间，节省脑力，用于学习其他更有益的“学问”。步骤是分两步走：在国界种界“未除”时，要学两种语言文字——“本国语言文字”及“万国通行之语言文字”；当国界种界已除，就要“舍”弃本国本种之语言，只用“万国通行之语言文字”，文字则“留为博古者之用”。

至于各种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关系，语言文字之巨大价值，即使在世界大同之日各国语言文字也不当“弃”、不能“弃”的理由，完全不在康有为的考虑之中。

康有为于19世纪末提出的“地球万音室(院)”，在《大同书》里说得更具体了。他的这一主张虽未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什么影响，也无理论价值可言，而作为一份历史资料，作为一种空想的观念，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考各地语言之法，当制一地球万音室。制百丈之室，为圆形，以像地球，悬之于空，每十丈募地球原产于其中。每度数人，有音异者则募置之，无所异者则一人可矣。既合全地之人，不论文野，使通音乐言语之哲学士合而考之，择其舌本最轻清圆转简易者，制以为音，又择大地高下清浊之音最易通者制为字母。凡物有实质者，各因原质之分合，因以作文字，其无质者，因乎旧名。择大地各国名之最简者如中国采之，附以音母，以成语言文字，则人用力少，而所得多矣。计语言之简，中国一物一名，一名一字，一字一音。印度、欧洲，一物数名，一名数字，一字数音，故文字语言之简，中国过于印度、欧、美数倍。故同书一札，中国速于欧、美、印度数倍。若以执事谈言算之，中国人寿，亦增于印度、欧、美数倍矣。惟中国于新出各物，尚有未备者，当采欧、美新名补之。惟法、意母音极清，与中国北京相近而过之。夫欲制语音，必取极清高者，乃宜于唱歌协乐，乃足以美清听而养神魂。大概制音者，从四五十度之间，广取多音为字母，则至清高矣；附以中国名物，而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写之，则至简速矣。夫兽近地故音浊；禽近空故音清。今近赤道之人音浊近兽，近冰海之人音清转如鸟，故制音者，当取法于四五十度也。闻俄人学他国语最易而似，岂非以其地度高耶？制语言文

字既定,以为书,颁之学堂,则数十年后,全地皆为新语言文字矣。其各国旧文字,存之博物院中,备好古者之考求可也。

(《大同书》,第7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

康有为的“地球万音室(院)”,也可称之为“世界语言文字研究院”,或可称为“语言文字全球化工作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挑选一批“通音乐言语之哲学士”,又从不同纬度中挑选“音异者”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其中北纬40度至50度的语音“极清高”,宜“广取多音为字母”。在此纬度之内的北京话、法语、意大利语及俄国、美国某些地方的语言都是首选对象。尤以中国字、中国音为“最简者”。看他的意思,似乎是以中国语、文为基础,补充一些欧美出现的“新名”,其“新语言文字”就可以定案了。几乎所有主张汉字改革的人都大骂或大批汉字如何如何不好,而康有为先生深深懂得:“中国文乃有韵味者,不易去也”,“文字语言之简,中国过于印度、欧、美数倍”。这就跟吴稚晖们有本质上的不同。他的文字观完全是由大同幻想引出来的。

## 二、无政府主义者的汉字文化观

20世纪初,受日、法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徒。其中有两位代表人物:吴稚晖(即吴敬恒,1865—1953<sup>[11]</sup>)、钱玄同(1887—1939)。他们在汉字文化问题上,都主张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汉字,都取虚无主义的民族文化态度,这两点都与大同派有别。其国际背景是:

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当世界语主义者在法国打下根基以后,世界语运动的中心便开始迁移到法国。在巴黎和法国一些大城市,许多学者和教授参加了世界语运动。

从1905年起,……每年都召开的全世界世界语者大会,往往有一千多人参加。……开始出现了若干专门杂志。

(〔俄〕德雷仁著、徐沫译《世界共通语史》,第31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当时正在巴黎的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也组织了世界社,并于1907年创办《新世纪》周刊,鼓吹无政府主义,推广万国新语。所谓“万国新语”,又译为“世界语”、“国际语”,原文为Esperanto,创刊者为波兰犹太人柴门霍夫(1859—1917)。1887年出版《国际语》课本<sup>[12]</sup>,1905年出版《世界语基础》。可是,正如章太炎所言:“万国新语者,本以

[11] 据《中国近代学人象传》记载,吴生于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865年3月25日。《辞海》作1866年,误。

[12] 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考世界语自1887年6月2日出生,至今才三十年。”(1917年《新青年》3卷4号)

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遍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且万国新语者,学之难耶,必不能舍其土风,而新是用;学之易耶,简单之语,上不足以明学术,下不足以道情志。苟取交通,若今之通邮异国者,用异国文字可也,宁可自废汉语哉!岂直汉语尔,印度、欧洲诸语犹合保存。盖学之近质者,非绵密幽邃之词,不足宣鬯。今之持无政府主义者,欲废强权,岂欲废学术耶!”〔13〕

“万国新语”既然是以欧洲诸语言为基础,“糅合以成”,当然与汉语体系不符。而且即使“印度、欧洲诸语犹合保存”,凭什么说汉文可以尽废呢?章太炎问得对呀,无政府主义者“岂欲废学术耶!”吴稚晖的回应是:

无政府党之能废强权,全恃乎能尊学术。尊学术必能排斥不足为学术者。不足为学术,而必固守其习惯,为妨碍于世界,即可与强权通论。即作者所谓“节奏”与“句度”,如其不合声响之定理,为甘带(盈按:带,指蛇。以带为甘美。参见《庄子·齐物论》)逐臭之偏嗜,何足以言学术?盖异日后民脑之细密,当别成美富之种姓,岂野蛮简单之“篇章”,所足动其情哉?故无论摆伦(即拜伦)之诗,汉士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院之料。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1908年7月25日《新世纪》第57号,以笔名“燃料”发表。收入《吴稚晖先生全集·国音与文字学》,第43页)

吴氏的驳议告诉人们,他之所以主张废汉文,甘“为万国新语之摇旗小卒”(见《全集》44页),根本原因他是一个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欧人脑理清晰,中人脑理胡涂”(37页)。“汉士之文”,要么就“摧烧之”,要么就“送入博物院”。因为这些“篇章”都是“野蛮简单”的东西。

无政府主义者也知道,要废汉语汉文,谈何容易!所以它们要“编造中国新语”,“以能逐字翻译万国新语为目的”(《全集》32页),其凡例云:

中国现有文字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既发(盈按:疑为“废”字)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亦有识者所具有同情矣。一旦欲使万国新语通行全国,恐持论太高,而去实行犹远。因时合势,期于可行,其在介通现有文字及万国新语,而预为通行万国新语地乎?编造中国新语,使能逐字译万国新语,即此意也。

(《编造中国新语凡例》,原载1908年3月28日《新世纪》第40号,以笔名“燃”发表,收入《吴稚晖先生全集》,第32、33页)

〔13〕《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国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594、59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凡例》的作者为前行,吴稚晖以“本报附注”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暂时之改良”法,办法之一,即“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又如日本之限制汉文”。(《全集》第35页)吴稚晖满怀信心地说:

第一法行,则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当之动作词等,皆可屏诸古物陈列院,仅供国粹家好嚼甘蔗滓者之抱残守缺,以备异日作世界进化史者为材料之猎取。所有限制以内之字,则供暂时内地中小学校及普通商业上之应用;其余发挥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万国新语,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

(《编造中国新语凡例》,《吴稚晖先生全集·国音与文字》,第35—36页)

这段文字表明了吴氏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观念,也表明他以“进化”的观点来看待语言文字,认为汉语汉字无法表述“新学理新事物”,它的“名物”属于“极野蛮时代”,这当然完全与实情不符。我引用这段文字主要不是为供批判用,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中间有太多的发人深思的问题。

我所说的“历史联系”,是指吴氏此文发表十年之后,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于1918年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引用这段文字作为证据。众所周知,钱玄同有两篇“明目张胆声讨汉字罪恶”<sup>[14]</sup>的檄文。一篇是1923年发表于《国语月刊》的《汉字革命》,另一篇就是上文说的1918年发表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是以与陈独秀通信的形式发表于该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此文现已收入《钱玄同文集》第一卷,读者不难见到。所以文中那些反理性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比吴稚晖有过之无不及的夸张之辞,在这里就不必一一引用了。而我要把吴钱相提并论的根据不能不有所交代。1917年钱氏在《论世界语与文学》中谈到了这种历史渊源。他说:“犹忆丁未(1907年)戊申(1908年)之间,刘申叔(师培)、张溥泉(继)诸君在日本,请彼国之大衫荣君教授此语(按:指世界语),其时日本此语亦始萌芽。一面吴稚晖、褚民谊两先生在巴黎著论于《新世纪》周报,大加提倡。而中国内地尚无人知之。己酉(1909年)秋冬间,上海始有世界语会。七八年以来,欧洲用此语出版之书籍,日新月异,中国人亦渐知注意。……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乃必欲放弃责任,让人专美,是诚何心!”<sup>[15]</sup>

如果只把世界语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或者作为辅助语来对待,未尝不可。<sup>[16]</sup>但

[14] 语出钱玄同《汉字革命》。钱氏以谭嗣同为首例,不确。谭氏并不认为汉字有什么“罪恶”。

[15] 《论世界语与文学》,1917年6月1日《新青年》第3卷4号。收入《钱玄同文集》第一卷,第2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 据2010年12月9日《北京青年报》报道,“目前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的会员只剩下300多名,而能够积极参加活动的也只剩下30到40人”。